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王庆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德] 马丁 海德格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德)海德格尔
(Heidegger, M.)著;王庆节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ISBN 978-7-5327-5144-0

I. ①康… II. ①海… ②王…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011 号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8

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1998 年版译出
(此版与 1991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 3 卷的页码文字完全相同)

图字: 09-2005-31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王庆节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210,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册

ISBN 978-7-5327-5144-0/B·321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译者序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是 20 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原为海德格尔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之一部分。^① 1929 年春天,在瑞士的达沃斯高等学校,海德格尔应邀就康德哲学作了三场讲座并和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恩斯特·卡西尔(E. Cassirer)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② 随后,海德格尔写成《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本书 1929 年出版第一版,后被海德格尔称为《康德书》。中译本根据德国法兰克福的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单行本第六版译出,而这一版,与 1991 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德文版第三卷,即单行本第五版扩充版,在文字和页码上完全相同。

迄今为止,《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在德国一共出版了 6 版。除去 1929 年的第一版外,第二版(1951 年)、第三版(1965 年)、第四版(1973 年)均于海德格尔生前再版,海德格尔为之分别撰写序言或前言。这里值得提出的是 1973 年出版的第四版扩大版。在这一版中,海德格尔新加了一个附录部分,其中含有关于他 1929 年在达沃斯高等学校的讲座纲要以及与卡西尔辩论的

① 参见本书第四版序言以及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蒂宾根: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1979 年),第 8 节,“本书章节的构想”。

② 参见本书附录Ⅲ:“达沃斯讲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一次形而上学奠基的任务”和附录Ⅳ:“达沃斯辩论:在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

两篇文献。海德格尔去世之后,《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第3卷在1991年出版,由海德格尔的最后助手,弗赖堡大学的哲学教授F·W·v·赫尔曼(F. W. v. Herrmann)编辑,这也是本书的第五版扩充版。全集版在附录部分中,除了第四版已有的2篇文献外,新加了4篇文献。而且,海德格尔在自己所存《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一版样书上的大量页边评注也作为脚注在全集版中收入。1998年出版的第六版单行本完全照搬1991年的全集版,未作任何更动和补充。关于《康德书》的版本以及出版方面的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收在本书结尾的赫尔曼教授的《编者后记》。^①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中文翻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弁宗三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从当时的英文译本转译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第16节、第25节以及第4、第5节的个别段落。^②后来,邓晓芒先生又从德文版翻译了第1章和第4章共13节,译文在孙周兴先生编辑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卷^③中出版。附录IV《达沃斯辩论:在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也曾在近几年中由辛启悟先生和赵卫国先生两次译出发表。^④虽然出于统一全书译名与风格的考虑,我对这些章节都进行了重译,但这些先前的译文,无疑为全书的翻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海德格尔在书中还多处引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翻译这些引文的过程中,我参照了

① 参见本书德文《全集》版编者后记。

② 参见弁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③ 参见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载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④ 参见辛启悟译:“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的达沃斯辩论”,载倪梁康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5期,2003年;赵卫国译:“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瑞士达沃斯的辩论”,载《世界哲学》,第3期,2007年。

李秋零先生和邓晓芒先生的两个中文译本。^①此外,理查·塔夫特(Richard Taft)1997年修订出版的英译本^②也是我时常参照的译本。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文,我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和我同时代的许多朋友相似,我的哲学学习和思考生涯,严格说来,也是从西方哲学原著的阅读和翻译开始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形而上学导论》的翻译工作。^③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在于,前两次是由熊伟先生和陈嘉映先生担任主译,我更多做的是辅助性的或者是部分性的工作,而这次从头至尾,基本由我一人担纲。熊伟老师和嘉映师兄对哲学翻译和思考的热忱、认真和谨严,一直是我为学和译述的标杆与楷模。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的对哲学经典的翻译经验,让我深知在汉语世界中译事的重要、艰辛以及前人工作的不易。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肇始于西学经典的汉语翻译,而且许久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高度和限度,也都和西学经典在汉语中的翻译水平息息相关。这一情形和格局,应当说至今未有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每一位有志于西学思想经典的译者,在面对原典时,首先需要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海德格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张冠李戴,那我们马上就知道这很危险,因为人命关天。但我们往往不太在意诗文经典的阐释,因为这好像无关紧要,反正“诗无达诂”,出不了

① 参见李秋零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参见理查·塔夫特译:《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五版扩充版,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什么大事。但海德格尔接着说,这只是似乎看起来无关紧要而已,“有朝一日——或许 50 年,或许 100 年——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①虽然海德格尔这里在讲诗文经典的阐释,但我想思想原典的阐释和翻译也是如此。50 到 100 年后,也许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好事乎?坏事耶?只是现在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已,故不得不慎!

中译本的注释共有 4 种。海德格尔的原注,页边评注,选用的英译注和中译注。中译注除了标明文中一些相关概念之间的字词和字义联系外,还着重说明了译者对有关核心概念的中文译名选用的考虑以及与一些现行中文译名间的异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译者本人对海德格尔和康德哲学乃至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和思考。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我将 4 种注释分别标明作为脚注列出。为方便读者,德文原文的页码也在相应译文的页边标明。正文中的()和[]符号,均为海德格尔原来使用。译者使用〈 〉符号,用于标明:a) 有必要列出的德文原文;b) 原书中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中译;c) 少量增添的文字以补足文句或语气。另外,原文中有些海德格尔生造的词或词组,例如“让对象化”(Gegenstehenlassen),“转过来面向……”(Zuwendung zu)等,我除了在译文中标明德文原文外,常常也加双引号,使之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或词组在中文中被辨别出来。

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开始于 2005 年,2006 年底译出初稿。初稿译出后,我有意将之闲置了一段时间。2008 年开始修改,2009 年春完成定稿。其间,曾以译稿为基础,2007 年秋季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开设“海德格尔与康德”的研究生课程;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超越论原理的学说》,蒂宾根: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1987 年,第 41 页。

2009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际前沿教师研习讲座,系列讲授“海德格尔《康德书》研究”。在研讨讲座过程中,译文的部分章节,曾作为讲义发给学生。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和提问,尤其是对我的译文的一些意见让我受益匪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仲辉,硕士生林尚德,分别帮助校读了译文全文或部分章节,均提出过一些建议,并在文字和文本编辑方面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还有陈嘉映、孙周兴、李秋零、倪梁康、张继武、李永平、赵卫国、关子尹、刘创馥、刘伟、Sebastien Billioud等诸位好友,我曾就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译名,和他们分别交换过意见。刘创馥、刘伟还对书中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译名和段落的翻译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协助。还有,远在巴黎的陶云飞小姐为书中出现的法文文献的查证,也提供过帮助。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方红玫女士(现任职于同济大学出版社)是帮助联系出版此书的最初联系人,戴虹女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她们的努力、耐心、包容和尽职、专业的编辑工作,这本译著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直接研究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德国哲学和思想的历史上,康德与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以思想内容艰深与行文晦涩著称。而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可谓集两者之大全。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我力求使用日常、平实和尽可能简单的中文语句来进行理解和翻译,但我深知,译文在很多地方难免仍旧屈居聱牙,甚至译错译漏。为此,我真心地希望专家学者和细心的读者,如发现译文中有任何不对、不妥、不好的地方,一定不吝赐教,以便来日再版时订正和修正。

王庆节

2009年6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第四版序言

在本书第一版样本的扉页处，夹有一张纸条。根据字迹判断，纸条应当写于 1930 年代中期，上面写着：

《康德书》。

仅仅通过《存在与时间》，——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

人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问题。（参见第一部分第三篇^①和
拆建〈Destruktion〉^②）

一条避难出路〈Zuflucht〉^③——在途中，

并不是对康德的语文学上的
新发现。——

[存在]存在物性—对象性

与“时间”

① 指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第 1 部分，第 3 篇。

② 指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第 2 部分：“存在论历史的拆建”。

③ “Zuflucht”在德文中的本义为“避难所”、“救助地”、“出路”等。海德格尔在这里使用此词，不仅暗示《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思路遇到了疑难，而且更想强调对《康德书》作为帮助其整理思路，积聚能量，找出出路之尝试的期待之心。因此，译为“避难出路”。——译者

图式化。

但同时：本己的道已被遮断，

曲径丛生。

参见第4章。^①

《论稿》^②—新的开端之开端—反思概念。

上面的笔记点明了决定出版《康德书》的动因，这就是：到1929年，已经变得很清楚，人们误解了《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存在问题。在准备1927/1928冬季学期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课程时，我关注到有关图式化的那一章节，并在其中看出了在范畴问题，即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与时间现象之间有一关联。这样，从《存在与时间》开始的发问，作为前奏，就催生了所企求的康德阐释的出场。康德的文本成为一条避难出路，在康德那里，我寻觅我所提出的存在问题的代言人。

如此这般规定的避难出路就引导我们，从《存在与时间》的发问视野来阐释《纯粹理性批判》；然而事实上，这就将康德的问题置放在一个它所陌生的，尽管它是以其为前提的发问之上了。

在后来的作品中（参见1965年第三版前言），我曾试图从对康德的过度诠释中退回，而不是在同时相应地重新撰写《康德书》本身。

汉斯格奥格·霍培（Hansgeorg Hoppe），在由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概观》中，1970年，第284—317页，对于我早年批判性地解释康德的立场中所发生的变化，

① 《康德书》，第4章。

② 《哲学论稿》，全集本第65卷。

提出了富有教益的、批评性的观察意见。

赫尔曼·默兴(Hermann Mörchen)在其马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康德的想象力》[载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11卷,马克斯·尼迈耶,哈勒(沙勒)出版,1930年,第311—495页;第二版(未更动),马克斯·尼迈耶,蒂宾根,1970年(单行本)]里,对《康德书》中开始的关于“先验想象力”的讨论进行了补充。

《康德书》是我第二次在达沃斯高等学校的讲课结束之后(192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在以前手稿的基础上立即写成的(参见本书第一版序言)。

目前这一版的《附录》中有一个概要,这是经过我过目的,为了我的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任务”的三次达沃斯讲演所做的概要。(发表在《达沃斯杂志》1929年4期7号,第194—196页。)

此外,还有一个关于我和恩斯特·卡西尔之间的、在我们的讲座结束后的辩论的报道。卡西尔曾就“哲学人类学”,更确切地说,就空间、语言和死亡为题作了三次讲演。^①

《康德书》保持为一种在充满质疑诘问曲径上探寻的导引,这一导引将我们引向那关于存在问题的可疑问性(Fragwürdigkeit),这一可疑问性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启端,还在进一步的延伸中。

对思的恐惧在不断增长,我们也不愿坦承面对它,这就使我们不再洞察那笼罩着这个时代的、对存在的遗忘。

出版人、荣誉法学博士、荣誉哲学博士维托里奥·克劳斯特

① 达沃斯辩论的文稿由O·F·博尔诺(O. F. Bollnow)与J·里特(J. Ritter)编撰而成。他们是达沃斯讲座的参与者。根据O·F·博尔诺的说法,这里不是逐字逐句地记录,而是事后根据在场笔记的重新整理。O·F·博尔诺提供了用于排印的打字稿,对此表示感谢。

曼先生长期以来对此书表示关心,在这里我要致以特别的感谢。威斯巴登的希尔德加德·法伊克博士与弗赖堡的大学讲师F·W·v·赫尔曼博士为本书作了细心的校勘工作,我对此也深表谢意。

马丁·海德格尔

1973年8月底

第一版序言

下面解释中的主要部分首先来自 1927—1928 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四课时的课程。后来,它又多次出现在讲演和系列讲座中(1928 年 9 月在里嘎(Riga)的赫尔德学院与今年 3 月在达沃斯高等学校的课程)。

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这一阐释与最初拟写的《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紧密相关。(参见《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埃德蒙德·胡塞尔主编,第 8 卷,1927 年,第 23 页注。单行本和现在出版的,经过校阅的第二版页码与“年鉴”版的页码相符。)

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中,本书研究的主题将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提问基础上得到探讨。在那里,我们对《纯粹理性批判》将不会进行某种逐步展开的阐释,目前的这本书应当成为其准备性的补充。

同时,本书作为“历史性”的导论会使得《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中所处理的疑难索问更加清晰可见。

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根据的本质》(参见《纪念胡塞尔》,《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增刊》,1929 年,第 71—110 页),进一步地澄清了这一导引性的提问,此书也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本书献给马克斯·舍勒,以作追忆。本书的内容曾经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的话题。在此次交谈中,作者得以重新感受到他那无拘无束的精神之力量。

巴登·黑森林的托特瑙堡

1929 年五旬节

第二版序言

这部作品 20 年前出版,立即售罄。这次未做任何改动。这样,它继续保留着它的样式,其中包含已引起反响的和尚未引起反响的方方面面。

我的阐释的强暴性〈Gewaltsamkeit〉不断地引起不满。人们对这一强暴的谴责完全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很好的支持。每当谴责将矛头对准思想者之间所要进行的一场思想对话之际,哲学历史的研究甚至总会站在谴责的这一方。历史语文学有着自身的任务,与它使用的方法相异,一场思想的对话遵循不同的法则,这些法则更加容易被违反。在一场对话中,走向错失的危险性越大,错失者就越多。

随着时空的流迁,手头这部研究作品中的已造成的错失和正在错失之处,对于正行进在思的道路上的我而言,变得如此清晰,这也使得我拒绝,通过订立正式的增补、附录以及后记,将本部作品变成一个东补西填的劣质货。

运思者从错失中学得更为恒久。

1950 年 6 月于弗赖堡

第三版前言

下面的提示或许有助于正确地理解本书的标题。形而上学疑难^①即是对存在物自身之整体的疑问,而这一疑问就使得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成为疑难。于是,“形而上学疑难”这一说法就有了双重含义。

作为对本书的补充,现在可以参阅《康德关于存在的命题》,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63年;以及《物的追问:康德关于超越论原理的学说》,蒂宾根: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1962年。

1965年春于弗赖堡

^① 在德文中,“das Problem”的意义为“难题”,通常也和“die Frage”(问题)混用,只是较为广泛、较为难解和难缠的问题罢了。海德格尔这里将此用在书名中,不仅强调形而上学的问题性质,而且更强调那在更加源初意义上的、使之成为问题的疑难索问之境域。和一般提问不同,这一疑问不必寻求解答,似乎也没有答案,它旨在深掘和开放那使之成为问题的源头或源初境域。基于这一理解,我在译文中将“das Problem”主要译为“疑难”,偶尔也根据上下文和语气需要译为“问题”、“疑问”或“疑难问题”。与此相关联,Problematik说的是疑难的整个索问路向和线索,包括背景情境、疑难性质,故译为“疑难索问”。——译者